

## ※ 研究動態 ※

# 近一百年日本《大學》研究概況 —— 1900-2014 年之回顧與展望

鍋島亞朱華\*

## 前 言

《大學》原為《禮記》中之一篇<sup>1</sup>，至宋代開始被重視，並在朱熹加以修改後，列為《四書》中之一書，與《論語》、《孟子》及《中庸》一同成為宋代之後儒家經典之主幹。

《四書》中《論語》應是最早傳至日本，據《日本書紀》、《古書記》記載，《論語》是由百濟學士王仁，在應神天皇十六年(285)時帶進日本<sup>2</sup>。雖然近年研究指出，此事應該僅屬於傳說<sup>3</sup>，無法證實，但對於《論語》一書在相當早期已傳至日本一事，學界則有共識。至於《大學》，以《禮記》之一篇傳至日本，據說是在六世紀時；一二四一年僧侶弁圓與佛典一同帶回《大學》與《大學或問》，於是朱熹對《大學》的新註首度傳至日本。以《四書集註》的形式傳至日本，據記載是鎌倉時代元應元年(1319)。由此可知，《大學》一書以《四書》的形式在日本被閱讀、研究至少已有七百餘年，對於日本漢學的影響亦非常深遠。進入江戶時代(十七世紀)，隨著《四書》的普及，日本漢學亦發展出獨特的經典詮釋。

---

\* 鍋島亞朱華，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sup>1</sup> 關於《禮記》的〈大學〉篇，已有工藤卓司先生撰寫之〈近一百年日本《禮記》研究概況——1900-2008年之回顧與展望〉，《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9卷第4期(2009年12月)，頁53-101。本文則以《四書》中的《大學》為主要論述。

<sup>2</sup> 《日本書紀》卷十、《古書記》中卷。

<sup>3</sup> 大庭脩：《古代中世における日中關係史の研究》(京都：同朋舍出版，1996年)，頁289。

## 一、江戶時代的《大學》研究

進入本論前先大致介紹江戶時代的《大學》研究，以利瞭解日本近一百年《大學》研究之基礎。江戶時期的學術思想史，尤其是《四書》學史，深受同時代或是稍早時期中國學術思想界的影響。雖然其受容方式有其特色，並不盡然是全盤接受，然而江戶時期的學術界，可說是極度依賴中國輸入的學術訊息。江戶時代正值中國的明朝末期至清朝中期，並受到此時的中國文化影響。此時輸入的大量中國書籍，不只有當時出版的新書，亦包含明代中期以前的書籍。然而須注意的是，即使有之前時代的資料，也是經由明朝末期至清朝中期的文化人之手傳至日本。如朱子、陸象山兩學派的思想，有系統地傳至日本是在江戶初期，而傳來的書籍即投射了同時期（明朝末期至清朝初期）中國思想界的動向。

討論江戶時期的《四書》學，另一項需要注意的，是朱子學傳至日本的時間。據傳說，最早是在一二〇〇年左右，然而當時或是由博士家獨占，或是由五山的禪僧兼修，並未廣泛流傳。朱子學的普及是進入江戶時代之後，在當時而言，朱子學相關的書籍與其他的書籍均屬於外來的新思潮。

論述江戶時期的學術思想史時，若要闡明與中國學術思想的關係，以朱陸論作為切入觀點，是有效的方法<sup>4</sup>。朱陸論（陽明之後為朱王論）是明末清初學術思想界中主要的一個議題，許多論述即是針對朱陸之爭而發。對《大學》的詮釋又是反映朱王論最明顯的資料，因此探討江戶時期的《大學》詮釋，可直接看出當時的中國學術思想，如何影響江戶時期的漢學者，進而亦可藉此看出江戶時代思想的潮流。不論是討論明代中期至晚期的思想特色，或是江戶時代的思潮，《大學》一書均是非常有用的資源。

以下根據江戶時代主要漢學者對《大學》詮釋的著作，概述《大學》研究的發展。為了方便掌握思想潮流的發展，故以時間為主軸，未以學派分類。

<sup>4</sup> 參見吉田公平：〈江戶後期の朱陸論——その由來を論じて一齋・中齋に及ぶ〉，源了圓編：《江戶後期の比較文化研究》（東京：ぺりかん社，1990年），頁89-142，後收入吉田公平：《日本における陽明學》（東京：ぺりかん社，1999年），頁105-176。

### (一) 藤原惺窩 (1561-1619) 《大學要略》

藤原惺窩是江戶時期新儒學（宋明理學）之先驅<sup>5</sup>。《大學要略》是其晚年的作品。《大學要略》在文本上採古本，但未對此有進一步的說明，亦未提及作者問題。對「明德」的解釋為「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五倫之五典」，認為「明明德」是「明發教導」五倫之德，而「親民」亦未採朱子「新民」之解釋，認為「民」是「士、農、工、商之四民之四業」，「親」是「親愛養育」之意。並且認為不須〈格物補傳〉。可見幾乎不採朱子的《大學章句》，除了傳十章部分有「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以外，本文完全依照《古本大學》，未有以《大學章句》的形式出現。

本書對於「格物」的解釋，將「物」解為「人化物」之「物」，這是根據《禮記·樂記》中「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而來；「格」則根據《尚書·冏命》中「繩愆糾謬，格其非心」，解為「格去」，這是依據林兆恩《四書標摘正義》的註解，上述「明德」的解釋，也是將林兆恩的解釋再加詮釋而已。林兆恩是明末以主張三教合一而著名的思想家，其思想即使是在經書詮釋多元化的明末，也被視為是特異的存在，藤原惺窩採取其說是非常值得注目的事。林兆恩的思想給予惺窩的影響，有待往後更深入探討<sup>6</sup>。

身為「日本朱子學開山祖」林羅山之師，後世往往將惺窩的思想視為折衷朱王<sup>7</sup>，然而他在《大學》詮釋上採用林兆恩的《大學正義纂》，可看出其接納明末新學說的態度。在探討明末思想剛進入日本時的受容情況，惺窩是值得注目的漢學者。

### (二) 林羅山 (1583-1657) 《大學諺解》（又名《大學章句解》）

林羅山是奠定江戶時代朱子學地位的儒者，被稱為日本朱子學之開山祖。在其《大學諺解》中，採取非常多明儒的註解，其中包含明末的李材、許孚遠、林兆

<sup>5</sup> 金谷治：〈藤原惺窩の儒學思想〉，石田一良等校注：《藤原惺窩・林羅山》（東京：岩波書店，1975年《日本思想大系》第28卷），頁449-470。

<sup>6</sup> 關於惺窩引用林兆恩的《四書標摘正義》解釋《大學》一事，金谷治在《大學要略》之註解中曾提及（石田一良等校注：《藤原惺窩・林羅山》，頁44、360-361）。

<sup>7</sup> 參照市川安司：〈近世儒學の黎明〉，《二松學舍大學夏季公開講座日本漢文學特輯》（東京：二松學舍大學陽明學研究所，1980年），頁67-84。

恩、管東溟、楊起元等人<sup>8</sup>。對江戶初期的漢學家而言，明儒的著述可說是最新的學說與資料。林羅山以朱子學者自居，持續吸收新資訊，他之所以收錄陽明學派，甚至是主張無善無惡說的楊起元，或三教合一的林兆恩等人的學說，應該是因為那是當時的新說，為了增廣見聞而採納，並非如惺窩是因為對其思想產生共鳴而採納。

《大學諺解》基本上是根據朱子的《大學章句》寫成，除了對《大學》本文的註釋外，收錄〈大學本異同〉、〈大學題號異說〉、〈明德親民異說〉、〈致知格物異說〉等篇章。其中〈大學本異同〉中舉出：

1. 大學古本（禮記）、2. 大學定本（章句）、3. 大學篆書（方孝儒序，鄭濟仲篆書，王柏、吳澄改本）、4. 蔡清本（見蒙引）、5. 王守仁本（禮記古本）、6. 鄭瑗本（改本）、7. 潘潢本（改本）、8. 鄭曉本、9. 林兆恩本（禮記古本）、10. 瞿元立石經古本（魏本）、11. 管志道本（賈逵本與鄭玄本大異）<sup>9</sup>

以上諸本未附本文，根據羅山的論述，可推測這十一本是他所知的《大學》文本及改本。羅山尊奉朱子之學，理所當然地也將《大學章句》視為定本，認為朱子的改訂有道理。值得一提的是，在舉出上述諸本後，羅山引用明儒許孚遠之說，否定《石經大學》，認為《石經大學》應是偽書<sup>10</sup>。在明代除了朱子的《大學章句》與王陽明提倡的《古本大學》以外，《石經大學》亦是影響極大的文本，並直接傳至日本。而此時的日本對於這三種系統的學說可說是幾乎同時接觸，均屬於「新學問」。在這樣的狀況下，林羅山對於《石經大學》能做出客觀的評價，亦可一窺其學問實力。

<sup>8</sup> 有關《大學諺解》，參見大島晃：〈林羅山の《大學諺解》について〉，《漢文學解釋與研究》第7輯（2004年12月），頁1-43。

<sup>9</sup> （）內的說明亦由林羅山撰寫，其中第三點的「方孝儒」或是「方孝孺」之筆誤。數字編碼由筆者所加。

<sup>10</sup> 引文如下：「許敬菴曰：顧叔時《通考》載，董文靖公槐更定《大學》本，取『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四十二字，置『聽訟吾猶人也』之右，以釋致知格物。蔡虛齋氏則提『物有本末』一條於『知止』一條之上。然當時格致訓解竝從朱先生，未有異也。近自鄭端簡《古言》內載《大學石經》本，以『物有本末』接『致知格物』之下，學者多信《石經》為古書，謂古書謂『格物』之『物』斷，即『物有本末』之『物』。余觀《石經》編次，殊不可曉，二千餘年忽有此本，多出好事者之為云云。」〈大學本異同〉，《大學諺解》（東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寫本），上卷，頁62b-63a。

(三) 中江藤樹 (1608-1648) 前期：《大學啟蒙》、《大學考》(漢文)、《大學序說》、《大學朱子序圖說》、《大學序宗旨圖》，後期：《古本大學全解》、《古本大學傍訓》、《大學考》(和文)、《大學蒙註》、《大學解》

在林羅山奠定朱子學的地位後，出現了被稱為日本陽明學始祖的中江藤樹。據〈藤樹先生行狀〉，藤樹在十四歲時閱讀《大學》而發憤圖強，修習朱子學。但在二十四歲時逐漸對羅山的朱子學感到不滿，三十三歲接觸陽明學說，轉而學習陽明學，進而成為日本陽明學的始祖。促使藤樹轉向陽明學的一個原因，即是《古本大學》，可見《大學》一書對藤樹而言極為重要。藤樹有關《大學》的著述現存有十種，可分為前期與後期，前期是學習朱子學時期的著述，後期是轉向陽明學之後的著作<sup>11</sup>。

前期著述依據朱子的《章句》，並且有些篇章只存數頁，其他部分已亡佚，較看不出特色；後期著述則顯示出藤樹學說的特徵。下文將以後期的《大學考》(和文)與《大學解》為例，介紹藤樹的《大學》詮釋。

《大學考》在文本上採用古本，是依據陽明的學說；分經、傳則依據朱子的學說。雖然依《章句》分經、傳，但關於〈格物補傳〉，藤樹則認為古本的文義通順，不需補傳。

在《大學解》中，藤樹解「格物」為：「格，正也。物，事也，指貌、言、聽、動、思之五事。」「致知」為「致良知」，並以「致良知」解釋「慎獨」。在《古本大學全解》中藤樹曰：「慎者，敬而不違之意；獨者，良知之別名。」是繼承陽明之說。而「慎獨」的概念，在藤樹的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藤樹除了受陽明思想的影響外，亦受《性理會通》及《王龍溪全集》影響很深<sup>12</sup>。故研究藤樹的《大學》詮釋，必須注意這一點。

中江藤樹後是他的弟子熊澤蕃山 (1619-1691)，因為他們的活躍，林羅山不得不撰寫《陽明攢眉》(已佚)批評陽明學。熊澤蕃山著有《大學或問》，此書被稱為《治國平天下別卷》，其內容論及人君、人臣的職責，並指出當時德川幕府施政

<sup>11</sup> 參見吉田公平：〈中江藤樹の四書學〉，《日本における陽明學》，頁 73-90。

<sup>12</sup> 山下龍二：〈中國思想と藤樹〉，山井湧等校注：《中江藤樹》(東京：岩波書店，1974 年《日本思想大系》第 29 卷)，頁 356-407。

的缺失，特別之處，在於文中未提及《大學》本文，更無註釋，可說是蕃山經世濟民思想的論說之精髓。

#### （四）山崎闇齋 (1618-1682) 《大學啟發集》

山崎闇齋原本是一位禪僧，二十五歲時轉向朱子學，徹底研究朱子的思想，後來形成崎門學派。闇齋為了彰顯朱子本人的思想，並未有直接表明自身論說的著作。其《大學啟發集》是引用《朱子語類》及《朱子文集》中對《大學》的解釋編輯而成。

跳脫朱陸之論爭，摸索新方向的有古義學的伊藤仁齋 (1627-1705) 與古文辭學的荻生徂徠 (1666-1728)，他們是日本漢學最具代表性的學者。仁齋有《大學定本》，徂徠有《大學解》<sup>13</sup>，均反映出其學說特徵。仁齋認為《論語》、《孟子》才是孔孟的血脈，《大學》不是聖人之意，批評朱子將《大學》視為孔子、曾子的學說，撰寫《大學定本》反駁朱子的註解。徂徠則認為「大學」是指「天子諸侯之都教人之宮」，是「行養老之禮」之處，故《大學》一書是為了君王記錄習禮之際的教訓。在文本上採取古本，認為不應分經傳，將本書分為八章。

#### （五）佐藤一齋 (1772-1859) 《大學欄外書》

佐藤一齋是在「寬政異學之禁」(1790)，官方獨尊朱子學之後，活躍於學界的儒者。他的思想被稱為是「陽朱陰王」，在公開場合講課時以朱子學為主，私下卻傾向於陽明學。門人有朱子學派的安積良齋、大橋訥庵，陽明學派的山田方谷、吉村秋陽等人。

在《大學欄外書》可以看見一齋較傾向陽明學的一面。《大學欄外書》是以一齋二十四、五歲時所著的《大學一家私言》為基礎，在五十八歲時增補改訂而成。內容以王陽明的學說為主，並收錄明清儒者的言論。

門人吉村秋陽 (1797-1866) 著有《大學臚議》(內閣文庫)，主張《大學》作者未詳，已無法考證。文本則採用《古本大學》，不分經傳。值得注意的是，其「格物說」引用明末儒者許孚遠之說；而且並未註明，但此書除了「格物說」之外，亦

<sup>13</sup> 關於荻生徂徠的《大學》詮釋，可參考澤井啓一：〈荻生徂徠の《大學》解釋〉，《フィロソフィア》(早稻田大學哲學會)第70號(1982年12月)，頁151-166、〈東アジアのなかの徂徠《大學》解釋〉，《季刊日本思想史》第70號(2007年4月)，頁42-63。

多處引用許孚遠之《大學述》，以往的研究並未注目於此。一般研究將秋陽歸類於陽明學派，或者視其為朱王折衷的思想，其實若仔細分析，可知他受明末儒者的影響甚深。在探討明末思想對江戶儒者影響時，這也是值得注目的現象。

其他尚有陽明學派三輪執齋(1669-1744)的《古本大學講義》、《古本大學俗解》(內閣文庫)，大鹽中齋(1793-1837)的《古本大學刮目》，山田方谷(1805-1877)的《古本大學講義》，還有被稱為「寬政三博士」之一的古賀精里(1750-1817)的《大學章句纂釋》，以及受到清代考據學派影響的大田錦城(1765-1825)的《大學原解》等，也都各具特色。

## 二、近一百年《大學》研究史

明治以後，歐洲的學問取代中國的學問，成為日本學問與教育的主流。島田虔次(1917-2000)認為在這種背景下，中國研究、中國思想史研究的領域逐漸形成三個學派：(一)以東京大學為中心的所謂「漢學」、「支那哲學」學派；(二)以京都大學為中心的「支那學」考證學派；(三)批判主義學派。他並說明如下：

第一派是繼承了德川時代以來的「儒者」的道德主義的傳統。宋學的研究，主要是由這一派進行(此派以宇野哲人為代表)。第二派是接受了清朝考證學的實證主義，並且將思想、哲學與其他廣泛的文化現象聯繫起來而進行研究(此派以狩野直喜為代表)。第三派是對中國的思想及思想家根本上抱持懷疑和否定的態度(此派以津田左右吉為代表)。<sup>14</sup>

當然這是概略性的分類方式。島田表示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前，中國研究的努力方向，在於將中國學問以西方哲學的方法重新組織，在這方面有一定的成果。

明治初期在學制改革下，以往的漢學、儒家的教養受到藐視。明治十年(1877)設立東京大學時，雖然在文學部設置「和漢文學科」，但事實上只是為了保存瀕臨廢絕的和漢學，其規模遠不及洋學。直到明治十三、四年一連串的學制改革，為了因應自由民權運動的高漲，便將其視為文教政策的一環，重新重視儒學教育。隔年暫時設置「古典講習科(國書科、漢書科)」，在哲學科中設立「東洋哲學」

<sup>14</sup> 島田虔次：〈戰後日本宋明學研究的概況〉(中文)，《中國哲學》第7輯(1983年8月)，頁147。

講座。此時期的畢業生，前者有瀧川龜太郎，後者有井上哲次郎(1855-1944)等人。明治二十二年(1896)以國家主義為背景，「漢學科」獨立為一學科，近代學術研究的「漢學」可說是在此時誕生。下文會提及的久保天隨(1875-1934)與宇野哲人(1875-1974)，即是在此制度下學習的畢業生(明治三十二[1899]、三十三年[1900])。到了明治三十八年(1905)，改制分為「支那哲學」、「支那史學」、「支那文學」<sup>15</sup>。

京都大學的文科開設於明治三十九年(1906)，中國研究領域由狩野直喜主導。狩野攝取西歐以法國為研究中心的「Sinologie」(Chinology)，並採清朝考證學的研究方法，奠定了「京都支那學」的基礎。受到「京都支那學」影響的有武內義雄(1886-1966)、吉川幸次郎等人。

根據日本國會圖書館「近代デジタルライブラリー」(近代數位圖書館)<sup>16</sup>，明治時期至一九〇〇年之前有關《大學》的著作(未含以《四書》為書名者)有二十三種，依成書年分排序如下：

1. ゼームス・レッジ (James Legge) 著，關吉孝譯：《大學英漢對譯》(東京：大和屋喜兵衛，1872年)。
2. 加藤熙：《大學講談》(東京：聚星館，1878年)。
3. 王守仁：《古本大學》(京都：東枝吉兵衛，1882年)。
4. 朱熹著，後藤松陰點：《(新版訂正)大學章句》(京都：若林喜助，1883年)。
5. 朱熹著，後藤芝山點：《(新刻改正)大學章句》(東京：水野幸，1883年)。
6. 朱熹著，後藤芝山點：《(新刻改正)大學章句》(名古屋：松雲堂，1884年)。
7. 安田吉太郎：《大學余師》(東京：澗松堂，1884年)。
8. 朱熹著，後藤芝山點：《(新刻改正)大學章句》(福岡：磊落堂，1885年)。
9. 岡三慶述，長岡道謙記：《大學講義》(東京：相生社，1885年)。

<sup>15</sup> 大島晃：〈日本における宋明儒學研究の概況〉，《國文學科紀要》(上智大學)第6號(1989年1月)，頁179-183。

<sup>16</sup> 收錄國會圖書館所藏之明治、大正、昭和初期之書籍。

10. 堀江惺齋述：《大學講義》（東京：有鄰堂，1885年）。
11. 春日仲淵著：《朱子大學句讀講義》（大阪：吉岡平助，1886年）。
12. 富永有鄰：《大學述義》（東京：忠愛社，1886年）。
13. 三國幽眠述，由良正秀、小泉武則校：《大學傍訓》（京都：一洗堂，1890年）。
14. 松平定信：《大學講義》（新潟：小林二郎，1892年）。
15. 稻垣真述：《大學、中庸講義》（東京：興文社，1892年）。
16. 下森來治述，土田士亮校：《大學中庸講義輯釋》（東京：法樹書屋，1892年）。
17. 田村看山：《大學訓蒙》（兵庫：田村捨三郎，1894年）。
18. 山本章夫編：《大學》（京都：村上書店，1896年）。
19. 戴聖、王守仁注，大鹽中齋補：《古本大學旁註》（東京：鐵華書院，1896年）。
20. 王守仁著，佐藤一齋補：《大學古本旁釋附大學問》（東京：六合館，1897年，啓新書院叢書）。
21. 上遠野格堂：《大學精義、中庸精義》（秋田：上遠野豐，1898年）。
22. 安井小太郎述：《大學》（東京：哲學館，1898年）。
23. 佐藤雲韶：《大學提要》（東京：金港堂，1899年）。

我們可以將上述二十三種書大致分類為以下四類：

- （一）新註新譯類：2、7、9、10、11、12、13、14、15、16、17、18、21、22、23。
- （二）翻刻朱熹《大學章句》類：4、5、6、8。
- （三）翻刻《古本大學》（含王守仁《大學古本旁釋》）類：3、19、20。
- （四）英漢對譯類：1。

其中第一類的新註新譯類數量最多，其底本多數是以朱熹的《章句》為依據，再加上自身的見解。第二類翻刻朱熹的《大學章句》，依據的則是江戶時代後藤芝山的訓點本<sup>17</sup>。第三類中的《大學古本旁釋》則是依據佐藤一齋、大鹽中齋之註釋本。由

<sup>17</sup>「訓點」是日本發展出來，為了閱讀中國文言文的記號。江戶時期在日本出版許多中國書籍，稱

第二、三類可見明治時期的《大學》研究，亦有以江戶時期的學術為基礎發展的一面。較能反映出明治維新氣象者，即是第四類的英漢對譯類，此書為 James Legge 所譯，原版一八六一年在香港出版。在日本是在明治五年 (1872) 時，以在漢文上加上訓點的方式出版。可見當時即使是在漢學領域，也注意到英語的運用。

近一百年日本的中國研究，即是在上述學術環境的基礎下進行，《大學》研究當然亦是在同樣的學術潮流中發展。以下將這近一百年的《大學》研究，區分為「戰前」與「戰後」等兩個階段進行分析討論。

### (一) 戰前：明治三十三年 (1900) 至昭和二十年 (1945)

此時期的《大學》研究以註釋、翻譯為主，有繼往開來的作用<sup>18</sup>。

久保天隨《四書新譯大學》<sup>19</sup>。一如書名，為《大學》之新譯。久保天隨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漢學科，後來以《西廂記の研究》(西廂記的研究)獲得博士學位，一九二八年起任教於當時的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東洋文學科。久保天隨在《四書新譯大學·總說》中敘述《大學》一書之內容為中國原始的倫理學說，因此應該以古代中國的觀點理解，而非以被佛學影響後之宋代朱熹的觀點理解。「新譯」的目的即是要發揮原始的意義，掃去因古今千百種註解而產生的眾說紛紜。因此在本書

為「和刻本」。和刻本會在原文旁邊附上訓點，使不會中文的人亦能閱讀中國古典。

<sup>18</sup> 關於《大學》註釋、翻譯有：深井鑑一郎述：《大學、中庸講義》(東京：誠之堂，1901年《中等教育和漢文講義》)；久保天隨：《四書新譯》(東京：博文館，1902年)；圓山溟北：《大學夷考》(出處未詳，附有美濃部楨1903年跋)；中村德五郎注：《大學新註、中庸新註》(大阪：石塚松雲堂，1909年)；濱野知三郎：《新譯大學中庸》(東京：至誠堂，1910年)；篠直方：《大學中庸講義》(東京：井一上書堂，1910年)；溪百年述，深井鑑一郎校：《大學中庸國字解》(東京：寶文館，1910年)；中村惕齋：《大學示蒙句解》，收入《漢籍國字解全書》(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21年)，第1卷；高森良人譯：《大學》，收入《支那哲學叢書》(東京：新光社，1922年)，第4卷；宇野哲人：《四書講義大學》(東京：大同館，1923年)；簡野道明：《大學解義》(東京：明治書院，1928年)；諸橋轍次：《大學新釋》(東京：弘道館，1929年)；水田勇賢：《大學中庸新解》(東京：改進書房，1930年)；內野台嶺：《四書新釋大學》(東京：賢文館，1935年)；岡田正三：《大學中庸孝經講義》(東京：第一書房，1936年)；岩部撓、深谷賢太郎：《四書研究大學論語解義》(東京：啟文社，1938年)；小牧昌業：《國譯大學》，收入《國譯漢文大成》(東京：國民文庫刊行會，1939年)，第1卷，後改為《國譯漢文大成》(東京：東洋文化協會，1955年)，第2卷；安井小太郎：《大學講義》(東京：東洋圖書，1940年)；岡井慎吾：《大學新講義》(東京：開成館，1941年)。

<sup>19</sup> 久保天隨：《四書新譯大學》(東京：博文館，1902年)。

中，作者引用儒家之書欲闡明儒家思想繼承之跡象，排除異學之影響。

久保天隨將《大學》分為八章，在每句後面加上自身的說明、詮釋，並不是採逐句翻譯或註解的方式。關於作者的問題，久保天隨認為篇首之大綱、主要部分成於曾子之手，再由曾子的門人加以解釋，附上數段文章而成。篇名之「大學」，應採廣義，即「學問之本領、精神」之義。經過江戶時期對《大學》作者之討論，在多數學者認為作者已不可考的情況下，久保再度提出曾子與其門人為作者之說，或許也可視為其特色。

宇野哲人《四書講義大學》<sup>20</sup>是由大同館出版的「漢文科參考書」<sup>21</sup>，因此以平易的解說為主。宇野哲人，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漢學科，亦有留學中國（清國）及德國的經驗，欲以西方哲學的方法論將中國哲學系統化。著有《支那哲學講話》等書。《四書講義大學》分為〈序論〉、〈大學章句序〉、〈大學〉及〈附錄〉。在〈大學〉原文後，附上「讀方（以日文古文標示）」、「字義」、「通解」，以朱熹的《章句》為主，亦說明王守仁之詮釋，並兼採江戶時代漢學者伊藤仁齋、荻生徂徠的學說。其中「格物」說依據荻生徂徠的說法，將「格物」解為「通曉六藝」，是較有特色之處。

諸橋轍次(1883-1982)《大學新釋》<sup>22</sup>，近年改版，由致知出版社在一九九五年出版。雖然書名為《大學新釋》，但仍是依據朱熹的《大學章句》，以平易近人的日文白話文解釋《大學》。諸橋為《大漢和辭典》的編撰者，他認為：

東洋的文化大半是以漢字漢語表現。不論是文藝或是思想，甚至是道德宗教皆是如此。因此若沒有漢字漢語的研究，是無法研究東洋文化的。<sup>23</sup>

《大學新釋》即反映此想法。此書分為〈解題〉、〈敘說〉、〈大學章句序〉、〈大學〉，在原文後有「訓讀（日文古文）」、「通釋（日文白話文）」、「語釋」、「余

<sup>20</sup> 宇野哲人：《四書講義大學》（東京：大同館，1923年）。

<sup>21</sup> 根據書後所附的目錄，除了《四書講義大學》以外的中國經典尚有：《四書講義中庸》、《唐詩選詳解》、《韓非子詳解》、《古文真寶（後集）詳解》、《左傳詳解》、《史記選讀》、《論語解義》、《唐宋八家文詳解》、《十八史略詳解》等，由此可窺見當時（大正時期）漢文教育之基本書目。

<sup>22</sup> 有關《大學》的著作，作者另有《現代に生きる《大學》》（東京：大修館書店，1989年）一書。

<sup>23</sup> 諸橋轍次編：《大漢和辭典·序》（東京：大修館，1955年），頁1。原文：「東洋の文化は、その大半が漢字漢語によつて表現されてゐる。それは文藝に於ても思想に於ても、將た又道德宗教に於ても皆然りである。それ故、漢字漢語の研究を外にして東洋の文化を云為することは不可能である。」

論」，其中「語釋」部分即非常注重字義解析，並以淺顯易懂的文字加以說明。

武內義雄《學記、大學》<sup>24</sup>。本書之特色，由其書名即可得知。作者跳脫《四書》以來的傳統，將《禮記》的〈學記〉篇與〈大學〉篇合為一書。關於此見解，作者以清儒陳澧及姜兆錫之說為根據，認為〈大學〉與〈學記〉有密切的關係。武內認為〈學記〉是記述學制與教育法，〈大學〉則是敘述大學教育的精神；〈大學〉須有〈學記〉才有根據，〈學記〉須有〈大學〉才能使其目的明白，兩者相輔相成。關於其成立年代，武內在引用清儒及日本學者之說後，認為兩篇均是漢武帝以後寫成，若考慮到《禮記》編者戴聖的時代，則應該可限定於武帝至宣帝的約一百年之間。根據此見解，武內總結云：

〈學記〉是記錄漢代的學校制度與教育方法，〈大學〉是闡明大學教育之精神所在，兩者一同為理解漢代學問及其理想之優良資料。<sup>25</sup>

由以上說明亦可知，本書是以《禮記》為底本，然而作者亦附上朱熹的《章句》，以及王守仁的〈大學問〉，使讀者能理解其解釋變遷。武內義雄畢業於京都帝國大學，專攻支那哲學史，之後任教於東北大學，著有《支那思想史》<sup>26</sup>等。狩野直喜為其指導教授，其學問繼承「京都支那學」的精神，此書可說是闡述其學說之結晶。

此時期除前述諸作外，亦有翻刻江戶時期漢學家之《大學》註解，主要以叢書的形式出版。如《日本倫理彙編》<sup>27</sup>收錄大鹽中齋《古本大學刮目》。《日本倫理彙編》由井上哲次郎及其弟子蟹江義丸(1872-1904)共同編輯。井上畢業於東京大學(明治十三年，1880)，並留學德國。在歐洲時立志撰寫「東洋哲學史」，並希望將德國哲學引進日本，主張西洋哲學與東洋道德之融合。他認為將日本以往的哲學以哲學史的概念整理，能夠成為聯絡往後哲學之道路<sup>28</sup>。《日本倫理彙編》也是以此理

<sup>24</sup> 武內義雄：《學記、大學》(東京：岩波書店，1943年)，後收入《武內義雄全集》(東京：角川書店，1979年)，第3卷，頁327-363。

<sup>25</sup> 武內義雄：〈序論〉，《學記、大學》，頁18。原文：「學記は漢代における學校の制度と教育の方法を記し、《大學》は大學教育の精神が那邊にあるかを闡明したもので兩者は相まつて漢代の學問及びその理想を窺ふべき好資料といふべきである。」

<sup>26</sup> 武內義雄：《支那思想史》(東京：岩波書店，1936年)，改版後書名更改為《中國思想史》(東京：岩波書店，1957年)。

<sup>27</sup> 井上哲次郎、蟹江義丸編：《日本倫理彙編》(東京：育成會，1901-1903年)。

<sup>28</sup> 大島晃：〈井上哲次郎の「東洋學哲學史」研究と《日本陽明學派之研究》〉，《陽明學》第9號(1997年3月)，頁28-43。

念編輯，將江戶時期漢學家分為陽明學派、古學派、朱子學派、折衷學派、獨立學派等，共十卷。其中有關《大學》的著述，只選擇了屬於陽明學派之《古本大學刮目》。

《漢文大系》<sup>29</sup> 收錄安井息軒 (1799-1876)《大學說》。《漢文大系》由服部宇之吉 (1867-1939) 編輯，服部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哲學科，留學清國、德國，繼承井上哲次郎提倡之融合西洋哲學與「東洋道德」之想法。歷任東京帝大、哈佛大學教授。《大學說》的解題亦由服部所撰，在解題中說明安井息軒《大學說》之稿本，係由其孫安井小太郎提供。《大學說》採古本，以鄭玄註為主，兼採清代學者之說。

《漢籍國字解全書》<sup>30</sup> 收錄中村惕齋 (1629-1702)《大學示蒙句解》。中村惕齋是與伊藤仁齋同時期之江戶時代的儒者，《大學示蒙句解》是根據普及於世間的朱子章句本講述。此書收於《漢籍國字解全書》，由早稻田大學出版，此系列收錄許多江戶時代漢學家之經書與古典的註解。出版的主旨，根據第一卷〈緒言〉可知：

在漢學精神旺盛的時代，以燃燒般的信念為動力所執筆的國字解書，其熱誠在紙上躍動，直接觸動讀者。當今陸續出版之冷淡的註釋書，完全不及以往的國字解書。<sup>31</sup>

所謂「國字解」即是以日文註解，由〈緒言〉的敘述可以得知，早稻田大學在出版此系列時，刻意選擇翻刻江戶時期的註釋書，認為江戶時代的漢學研究遠比當時（大正時期）精緻，且富有卓見，因此江戶時期之「國字解書」是當時學者所急切需要的。

另外亦有關儀一郎編《日本名家四書註釋全書》<sup>32</sup>，收集了江戶時代關於《四書》的註釋四十三部，是目前閱讀江戶時期漢學家之《四書》註釋時，極為方便的資料來源。

<sup>29</sup> 《漢文大系》（東京：富山房，1909-1916年）。

<sup>30</sup> 《漢籍國字解全書》（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21年）。

<sup>31</sup> 原文：「漢學的精神の旺盛なる時代に當り、燃ゆるが如き信念に動かされて執筆したる國字解書に至りては、其熱誠紙上に躍り讀者に迫るの概なくんばならず。これ近時續出の冷々淡々たる注釋書を以て、遙に往時の國字解書に及ばずと為す所以なり。」《漢籍國字解全書·緒言》，卷1，頁10。

<sup>32</sup> 《日本名家四書註釋全書》（東京：東洋圖書刊行會，鳳出版復刻，1922-1930年）。

除了註釋、翻譯之外，關於探討《大學》的成書年代、作者的論文，是此時期的特色。如：蟹江義丸〈曾子の學につきて〉（關於曾子之學）<sup>33</sup>、武內義雄〈曾子考〉<sup>34</sup>、〈大學篇成立年代考〉<sup>35</sup>、勝又憲次郎〈曾子略考〉<sup>36</sup>等。另有津田左右吉〈大學の致知格物について〉（關於大學的致知格物）<sup>37</sup>，以批判主義學派<sup>38</sup>的角度探討「致知格物」的內容意義，以及宇野哲人〈大學の三綱領〉（大學的三綱領）<sup>39</sup>等。

## （二）戰後：昭和二十一年（1946）至平成二十二年（2010）

日本在敗戰後，對於中國研究也有了變化。之前稱為「支那哲學」、「支那文學」，戰後改為「中國哲學」、「中國文學」。戰後的研究一方面繼承與發展戰前、戰中的研究方法，一方面摸索新的研究方法。島田虔次認為戰後除了上述之三學派外，又產生了第四：思想史的研究，以及第五：馬克斯主義的研究法<sup>40</sup>。

此時期對於《大學》翻譯、註釋的數量未及前期，但以其成果而言，並不亞於前期。除了探求作者、成書時期的討論以外，《大學》研究結合思想史的研究方法，重視宋明以後的詮釋史。尤其是明代《大學》詮釋的研究，是前期較少見的。

島田虔次《大學、中庸》<sup>41</sup>。本書編撰之主旨可從作者撰寫之〈解說〉得知。島田開宗明義即表示：

本書不是根據獨自的研究、見識的註釋書，而是徹頭徹尾介紹朱子學，不，是朱子本人的註釋、解釋，即使不得已必須加入自己的解釋，也盡量站在朱子的立場來註釋，這即是本書的目的。若本書多少能有所謂的特色，應該也

<sup>33</sup> 蟹江義丸：〈曾子の學につきて〉，《哲學雜誌》第16冊第177號（1901年11月），頁873-886。筆者未見。

<sup>34</sup> 武內義雄：〈曾子考〉，《支那學》第1卷第7號（1921年3月），頁35-45，後收入《武內義雄全集》（東京：角川書店，1978年），第2卷，頁446-454。

<sup>35</sup> 武內義雄：〈大學篇成立年代考〉，《支那學》第3卷第9號（1924年9月），頁20-27，後收入《武內義雄全集》，第3卷，頁310-316（內容與《大學、學記·序論》相同）。

<sup>36</sup> 勝又憲次郎：〈曾子略考〉，《斯文》第15編第12號（1933年12月），頁16-22。

<sup>37</sup> 津田左右吉：〈大學の致知格物について〉，《東洋思想研究》第1號（1937年3月），頁1-32，後收入《津田左右吉全集》（東京：岩波書店，1965年），第18卷，頁253-281。

<sup>38</sup> 島田虔次：〈戰後日本宋明學研究的概況〉（中文），頁147。

<sup>39</sup> 宇野哲人：〈大學の三綱領〉，《斯文》第21編第5號（1939年5月），頁1-5。

<sup>40</sup> 島田虔次：〈戰後日本宋明學研究的概況〉（中文），頁147。

<sup>41</sup> 島田虔次：《大學、中庸》，收入《新訂中國古典選》（東京：朝日新聞社，1967年），第4卷。

是在這一點。<sup>42</sup>

就是說本書的目的，在闡明朱子的學說、思想。作者並強調，他所介紹的不是「朱子學」而是「朱子本人」的註釋、解釋。島田亦在〈解說〉中說明理由：

《大學》、《中庸》的註釋書——今日一般讀者所接觸的，較少是德川時代的註釋，多為明治以後，大正、昭和學者所作——其底本即使未特別註明，也以朱子的《章句》居多，然而徹頭徹尾以《章句》之說貫徹之註釋書，其實並不多，可說是幾乎未見。<sup>43</sup>

島田認為朱熹是一位偉大有學說體系之哲學家，因此在註解時，有時並不是忠實於原典，而是忠實於自身的學說體系，以今日的眼光來看，其解釋會顯得不自然。故許多註釋書即使是以《章句》為底本，也必須視情況捨棄朱熹之註釋。但就因為是如此，島田刻意選擇完全根據朱熹的想法，以現代日文為《章句》作解釋。若是《章句》未有註解的部分，即參照《朱子語類》、《大學或問》，或者有時是從《朱子文集》尋找資料。

另有一點值得矚目的是，作者為了使朱熹的學說更明確，常舉王守仁的學說與朱熹的說法做比較。島田虔次畢業於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史學科，研究領域為中國思想史，其主要著作為《中國における近代思惟の挫折》（中國近代思維的挫折）<sup>44</sup>，對於王陽明與陽明學派的思想有精闢的討論。因此閱讀此註釋書，一方面可以完整

<sup>42</sup> 島田虔次：《大學、中庸》，頁1。原文：「まず最初におことわりしておきたいのは、本書がけっしてわたくし独自の研究、見識にもとづく独自の注釋書では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ある。そうではなくて徹頭徹尾、朱子學の、否、朱子その人の注釋、解釋の紹介、萬やむを得ずしてわたくし自身の解釋をしるさねばならぬとしても、できるだけ朱子その人の立場に立とうと試みての注釋——それが本書のめざしたところに他ならない。もし本書に多少とも特色というものが認められるとするならば、それはこの點にあるであろう。」

<sup>43</sup> 同前註，頁2。原文：「はっきりうたっているかないかの差はあっても《大學》、《中庸》の註釋書——今日の一般讀者の眼にふれるのは、徳川時代のそれであるよりはより多く明治いご大正昭和の學者の書きおろしたそれであるが——が底本として取っているのは朱子の《章句》なのであるが、同時にまた、徹頭徹尾、《章句》の説でおし通してあるという注釋書も、今日では、必ずしも多くない、というよりむしろ殆んど見當たらないうほうの方が真相に近いであろう。」

<sup>44</sup> 島田虔次：《中國における近代思惟の挫折》（東京：筑摩書房，1949年，改訂版1970年，新版1986年），後由井上進加上註解分為二冊再度出版（東京：平凡社，2003年）。本書已有中譯本，甘萬萍譯：《中國近代思維的挫折》（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

理解朱熹對《大學》的立場與學說，亦可了解宋代與明代對《大學》詮釋的異同。這也是因為作者為宋明思想史的專家，才能有如此的成果。

赤塚忠 (1913-1983) 《大學、中庸》<sup>45</sup>。赤塚忠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支那哲學科，後來任教於東京大學。專門領域為中國古代思想，並研究甲骨、金古文。作者在〈解說〉中提及作為古典的《大學》之價值：

《大學》有著相隔千餘年還能提供解決時代問題的指針，……程、朱會尊奉《大學》，並不只是因為《大學》是孔子、曾子的遺書，也不只是因為《大學》可以完成道統之傳。而是因為他們在《大學》中尋找到關於道德問題的普遍意義。……《大學》提供了人類必須思考的問題，因此延續了身為古典的生命。即使在現代，對於思索人生的人而言，《大學》不只能給予過去的思想知識，也能成為新的思想形成之試金石。<sup>46</sup>

本書以《禮記·大學》為主，亦附朱熹的《大學章句》。較有特色的是，除了訓讀、現代日文翻譯外，每一節亦有作者的「解說」及「余說」，表達作者自身的意見。

侯野太郎《大學、中庸》<sup>47</sup>。作者在〈解說〉中，先以相當的篇幅解釋《禮記》一書，並描述〈學〉、〈庸〉二篇的流傳與表彰。《大學》部分的解說，首先舉出作者與成書年代的問題，再提及「大學」名稱的問題，均兼舉歷代中國與日本學者的學說，並認為作者應無法斷定，名稱問題則採「以篇首二字命名」一說。此書較有特色之處，猶如作者在〈後記〉所云：

本書雖是《學》、《庸》二書之完整講義，但對於二書的掌握方式卻不同。《大學》是依據朱子的《章句》精確解說，並全面仰賴《四書訓蒙輯

<sup>45</sup> 赤塚忠：《大學、中庸》，收入《新釋漢文大系》（東京：明治書院，1967年）。

<sup>46</sup> 赤塚忠：〈大學解說〉，《大學、中庸》，頁37-38。原文：「《大學》には千餘年を隔ててもその時の人間の問題を解決する指針があり、……程・朱が《大學》を尊信したのは、必ずしも孔子・曾子の遺著であるからでも、それによって道統の傳が完成するからでもない。そこに道德問題に対する普遍的意義を見いだしていたからである。……《大學》は、常に人間が考えなければならぬ問題を提供するという、古典としての生命を持ち続けているのである。現代においても、思索するものにとっては、單に過去の思想の知識を与えるだけでなく、新たな思想形成の試煉の資となるであろう。」

<sup>47</sup> 侯野太郎：《大學、中庸》，收入《中國古典新書》（東京：明德出版社，1968年），第12卷。

疏》<sup>48</sup>。……《中庸》則依《禮記》注疏本，……以鄭玄、孔穎達等人之注疏為本，並兼採朱子等諸家之說，試圖探索原義。<sup>49</sup>

《大學》本文的註解，採朱熹的《章句》，分為經一章，傳十章。在每一段落之後將朱熹的註解翻譯為現代日文後，再進行解釋。解釋部分，基本上是參閱安部井帽山的《四書訓蒙輯疏》，引用諸多明清時期中國儒者之學說，與江戶時期日本漢學家之學說。這或許也可視為是繼承江戶時期學問的象徵。

山下龍二《大學、中庸》<sup>50</sup>。作者在〈序說〉中將歷代的《大學》、《中庸》詮釋方法分為四種：1. 邏輯（哲學）的詮釋法，2. 心情的詮釋法，3. 文獻學的詮釋法，4. 文字學的詮釋法。作者表示本書並不取上述任何方式，亦不採新方式，而是採介紹「解釋史」的方式。因此本書在〈解說〉中記述《大學》、《中庸》詮釋的歷史。期間是從《大學》、《中庸》成書至明代末期為止。未述及清代，因為清代並未像宋、明特別重視《大學》、《中庸》二書，因此與思想史的密切性也相對較淡，應另以清朝考證學的角度做整理。山下認為以往的研究，將問題意識過分集中於追求古典的原義，被視為錯誤的解釋隨即被丟棄。然而即使是錯誤的解釋，若能分析思想家們為何會得到這樣的結論，即能理解他們的思想，並能得知其時代的思想潮流。如此一來，古典的解釋史則會轉化為中國思想史。

根據上述之原則，本書採用的文本是清代的《十三經注疏》本《禮記正義》，將註解分為鄭玄之古註與朱熹之新註，並有明代陽明學派的註釋。至於與《大學章句》之異同，則以「補說」的形式註明。除了中國歷代的詮釋以外，也列舉伊藤仁齋、荻生徂徠等日本獨特的詮釋。將歷代的詮釋本身視為一門學問，則是本書之特色，亦是其貢獻。

金谷治(1920-2006)《大學、中庸》<sup>51</sup>。金谷治為武內義雄的學生，一九四四年畢

<sup>48</sup> 江戶時代會津藩儒安部井帽山所作。

<sup>49</sup> 俣野太郎：《大學、中庸》，頁 302。原文：「本書は《學》・《庸》二書の全講義であるが、取扱いは同じでない。《大學》は朱子の章句をもって正確に解釋しようとし、全面的に《四書訓蒙輯疏》の所説に依存した。……《中庸》の方はこれと異って、《禮記注疏》本の章・節の區分に従い、……鄭玄（後漢）孔穎達（唐）らの注疏を土台としつつ朱子初め諸家の説を取捨し、敢えて原義に迫ろうと試みてみた。」

<sup>50</sup> 山下龍二：《大學、中庸》，收入《全釋漢文大系》（東京：集英社，1974年），第3卷。山下龍二(1924-2011)，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支那哲學文學科畢業，後任名古屋大學教授。

<sup>51</sup> 金谷治：《大學、中庸》（東京：岩波書店，1998年）。

業於東北帝國大學法文學部支那哲學科，研究領域為中國古代思想史。在武內編撰《大學》譯註後五十年，金谷也為岩波書店編寫《大學》註釋書。然而與武內不同的是以《大學、中庸》的形式出版。雖然形式不同，但基本上金谷也認為若要追究《大學》的成書時期及其內容意義，應該離開《四書》的框架，而以《禮記》的角度讀《大學》。本書即是以此觀點出發，探究古註，追求真義。在〈解說〉中金谷提及伊藤仁齋的古義學，說明自己也是將古義擺在第一位，因此在註解中，若朱熹的解釋是有助於闡明古義，則採用其說，但不採取根據朱熹哲學發展的新詮釋。然而朱熹的新註在《大學》詮釋的歷史上亦不可忽視，故亦對《大學章句》作註解。

由於上述之考量，本書《大學》的部分分為：1.《大學》解說，2.《大學》（舊本）本文（本文後有訓讀、註解、現代日文翻譯），3.《大學章句》序、本文（本文後有訓讀、註解、並將朱熹註解的主要部分翻為現代日文）等三部分。雖是以《禮記》中的《大學》為主體，但亦有《大學章句》的譯註。

除了註釋、翻譯外，近年有伊與田覺之《己を修め人を治める道：《大學》を味讀する》（修己治人之道：品味《大學》）<sup>52</sup>，以平易的文字介紹《大學》的內容。

另有值得矚目的成果，是將博士家所傳的《大學》註釋加以翻刻，如：出版清原宣賢<sup>53</sup>之《大學聽塵》<sup>54</sup>。該書分為「翻刻之部」與「影印之部」，將難解的古文書翻刻成現代的字體外，也保存了古書原貌，方便讀者翻閱、研究。

戰後的單篇論文之研究方向，除了對於《大學》文本之研究、內容之探究外<sup>55</sup>，最有特色的即是傾向於宋明時期《大學》詮釋的研究。研究內容與思想史的發展相

<sup>52</sup> 伊與田覺：《己を修め人を治める道：《大學》を味讀する》（東京：致知出版社，2008年）。

<sup>53</sup> 清原宣賢（1475-1550），日本戰國至室町時代博士家學者。

<sup>54</sup> 四書註釋書研究会編著，戶川芳郎、大島晃、町泉壽郎監修：《清原宣賢漢籍抄翻印叢刊I》（東京：汲古書院，2011年）。

<sup>55</sup> 板野長八：〈大學篇の格物致知〉，《史學雜誌》第71編第4號（1962年4月），頁1-55；木村英一：〈大學と中庸〉，《懷德》第33號（1962年7月），頁1-27，後收入《中國哲學の探求》（東京：創文社，1981年），頁235-264；村瀨雅行：〈《大學》「格物致知」說の研究〉，《國文學論考》（都留文科大学）第13號（1977年3月），頁26-38；片上一：〈大學篇八條目に關する一考察〉，《大正大學大学院研究論集》第1集（1977年3月），頁151-163、〈大學の作者と成立年代〉，《大正大學綜合佛教研究所年報》第4號（1982年3月），頁83-97、〈禮記・大學篇の「大學之道」——天子の道としての〉，《大正大學綜合佛教研究所年報》第5號（1983年3月），頁73-89；吉田照子：〈大學篇の經濟思想〉，《福岡女子短大紀要》第28號（1984年12月），頁153-163。

呼應，可分為：1. 朱子學《大學》改本方面的研究，2. 王陽明與《古本大學》的研究，3. 明代流行之《偽石經大學》的研究，4. 陽明之後的《大學》詮釋等。有關朱子學的如：市川安司〈朱子哲學に見える「知」の一考察——《大學章句》「致知」の注を中心にして〉（朱子哲學中「知」的一種考察——以《大學章句》「致知」注為中心）<sup>56</sup>、戶田豊三郎〈宋代における大學篇表章の始末〉（宋代大學篇表章始末）<sup>57</sup>、木南卓一〈朱子學に於ける中庸と大學〉（朱子學中的中庸與大學）<sup>58</sup>、角田達朗〈朱熹格物致知説の再検討〉（朱熹格物致知説的再検討）<sup>59</sup>、吾妻重二〈格物窮理のゆくえ——朱熹以後における二つの方向〉（格物窮理的趨向——朱熹以後的兩個方向）<sup>60</sup>、木下鐵矢〈「事」「物」「事物」「事事物物」——朱熹の「致知在格物」解釋を理解するために〉（「事」「物」「事物」「事事物物」——朱熹「致知在格物」詮釋之理解）<sup>61</sup>、〈朱熹「格物」理解の構造——「有物有則」解釋をめぐって〉（朱熹「格物」理解的構造——關於「有物有則」的詮釋）<sup>62</sup>。有關王陽明的《大學》詮釋有：友枝龍太郎〈陽明の大學解釋について——誠意と致良知〉（關於陽明的《大學》詮釋——誠意與致良知）<sup>63</sup>、笠井清〈王陽明の《大學》解釋と「自慊」〉（王陽明的《大學》詮釋與「自慊」）<sup>64</sup>、橋本敬司〈王陽明の事的世界觀——「格物」解釋を

<sup>56</sup> 市川安司：〈朱子哲學に見える「知」の一考察——《大學章句》「致知」の注を中心にして〉，《東京大學教養部人文科學科紀要》第9號（1956年6月），頁45-86，後收入《朱子哲學論考》（東京：汲古書院，1985年），頁29-49。

<sup>57</sup> 戶田豊三郎：〈宋代における大學篇表章の始末〉，《東方學》第21輯（1961年3月），頁46-56。

<sup>58</sup> 木南卓一：〈朱子學に於ける中庸と大學〉，《帝塚山大學紀要》第3號（1967年6月），頁48-74。

<sup>59</sup> 角田達朗：〈朱熹格物致知説の再検討〉，《日本中國學會報》第45集（1993年10月），頁111-125。

<sup>60</sup> 吾妻重二：〈格物窮理のゆくえ——朱熹以後における二つの方向〉，《關西大學文學論集》第52卷第1號（2002年9月），頁1-41，後收入《朱子學の新研究》（東京：創文社，2004年），頁356-390。

<sup>61</sup> 木下鐵矢：〈「事」「物」「事物」「事事物物」——朱熹の「致知在格物」解釋を理解するために〉，《東洋古典學研究》第20號（2005年10月），頁33-66。

<sup>62</sup> 木下鐵矢：〈朱熹「格物」理解の構造——「有物有則」解釋をめぐって〉，《東洋古典學研究》第23號（2007年5月），頁59-75。

<sup>63</sup> 友枝龍太郎：〈陽明の大學解釋について——誠意と致良知〉，《哲學》（廣島哲學會）第13號（1961年10月），頁碼未詳，筆者未見。

<sup>64</sup> 笠井清：〈王陽明の《大學》解釋と「自慊」〉，《倫理學年報》第20號（1970年月分未詳），頁

巡って) (王陽明「事」的世界觀——關於「格物」詮釋)<sup>65</sup>、水野實〈王守仁の《大學古本傍釋》の考察〉(王守仁《大學古本傍釋》的考察)<sup>66</sup>及〈《大學古本傍釋》の特質——解釋の方法とその實相〉(《大學古本傍釋》の特質——詮釋方法及其實相)<sup>67</sup>。此外，水野亦有討論《古本大學》在明代中期流行之背景的論文：〈明代における《古本大學》顯彰の基盤——その正當化の方法と後學の狀況〉(明代《古本大學》彰顯的基礎——其正當化之方法與後學的狀況)<sup>68</sup>。《偽石經大學》在明代亦是《大學》研究的重要議題之一，關於此，水野亦有探討：〈《偽石經大學》考——その出自と流傳そして波紋及び異本と原本〉<sup>69</sup>。近年有關陽明之後學的《大學》詮釋方面的研究亦有諸多成果，如：鶴成久章〈高攀龍の「格物」說について〉(高攀龍的「格物」說)<sup>70</sup>、水野實〈李材の《大學古義》について〉(李材的《大學古義》)<sup>71</sup>、〈季本の《大學》改訂本再考〉(季本《大學》改訂本再考)<sup>72</sup>、〈季本の《大學私存》の本文構造と意味〉(季本《大學私存》的文本結構與意義)<sup>73</sup>、鍋島亞朱華〈李見羅の《大學》解釋〉(李見羅的《大學》詮釋)<sup>74</sup>、〈王心齋の淮南格物說につい

173-186，筆者未見。

- <sup>65</sup> 橋本敬司：〈王陽明の事的世界觀——「格物」解釋を巡って〉，《中國學論集》(安田女子大學)第4號(1993年2月)，頁24-37。
- <sup>66</sup> 水野實：〈王守仁の《大學古本傍釋》の考察〉，《日本中國學會報》第46集(1994年10月)，頁132-149。
- <sup>67</sup> 水野實：〈《大學古本傍釋》の特質——解釋の方法とその實相〉，《中國古典研究》第40號(1995年12月)，頁47-64。
- <sup>68</sup> 水野實：〈明代における《古本大學》顯彰の基盤——その正當化の方法と後學の狀況〉，《日本中國學會報》第41集(1989年10月)，頁151-166。
- <sup>69</sup> 水野實：〈《偽石經大學》考——その出自と流傳そして波紋及び異本と原本〉，《防衛大學校紀要人文科學分冊》第57輯(1988年12月)，頁21-70。
- <sup>70</sup> 鶴成久章：〈高攀龍の「格物」說について〉，《集刊東洋學》第68號(1992年11月)，頁76-93。
- <sup>71</sup> 水野實：〈李材の《大學古義》について〉，《斯文》第102號(1992年12月)，頁19-37。
- <sup>72</sup> 水野實〈季本の《大學》改訂本再考〉，《東洋の思想と宗教》(早稻田大學東洋哲學會)第12號(1995年3月)，頁19-39。
- <sup>73</sup> 水野實〈季本の《大學私存》の本文構造と意味〉，《斯文》第107號(1999年3月)，頁17-42。
- <sup>74</sup> 鍋島亞朱華：〈李見羅の《大學》解釋〉，《大學院紀要二松》(二松學舍大學)第16集(2002年3月)，頁377-396。

て）（王心齋の淮南格物説）<sup>75</sup>、吳端〈高攀龍の格物論〉（高攀龍的格物論）<sup>76</sup>、松野敏之〈王夫之《大學》解釋〉<sup>77</sup>、伊香賀隆〈王龍溪の「格物」について〉（關於王龍溪の「格物」）<sup>78</sup>等。在上述的研究之外，還有高橋進以專書比較朱熹與王守仁的思想，此書之第四章〈《大學》改訂の歴史的経緯と朱子章句〉（《大學》改訂の歴史原委與朱子章句）、第五章〈朱子と王陽明の《大學》解釋〉（朱子與王陽明的《大學》詮釋）是以《大學》為主軸的分析、比較<sup>79</sup>。最近則有綜觀宋明以後之「格物説」研究：中純夫〈本末格物説攷〉<sup>80</sup>。淺野裕一〈《大學》の著作意圖——「大學之道」再考〉（《大學》的撰寫意圖——「大學之道」再考）<sup>81</sup>收入《出土文獻から見た古史と儒家經典》（從出土文獻看古史與儒家經典）一書，試圖由出土文獻重新解讀《大學》著述之目的。

除了上述的論文外，亦有關於江戶時期漢學家的《大學》詮釋研究：澤井啓一〈荻生徂徠《大學》解釋〉<sup>82</sup>、荻生茂博〈大鹽中齋の人間觀——《大學》解釋をめぐる〉（大鹽中齋の人性觀——關於《大學》詮釋）<sup>83</sup>、早川雅子〈淺見綱齋の《大學》解釋に關する一考察：思辨的理から情誼的理へ〉（關於淺見綱齋《大學》詮釋的一種考察：從思辨之理到情誼之理）<sup>84</sup>、楊宏民〈藤原惺窩の「格物」論につい

<sup>75</sup> 鍋島亞朱華：〈王心齋の淮南格物説について〉，《陽明學》第16號（2004年3月），頁114-125。

<sup>76</sup> 吳端：〈高攀龍の格物論〉，《九州中國學會報》第44號（2006年），頁16-29。

<sup>77</sup> 松野敏之：〈王夫之《大學》解釋〉，《論叢アジアの文化と思想》第18號（2009年12月），頁1-28。

<sup>78</sup> 伊香賀隆：〈王龍溪の「格物」について〉，《白山中國學》（東洋大學）第16號（2010年1月），頁35-54。

<sup>79</sup> 高橋進：《朱熹と王陽明——物と心と理の比較思想論》（東京：國書刊行會，1977年），頁174-217、224-263。

<sup>80</sup> 中純夫：〈本末格物説攷〉，《日本中國學會報》第62集（2010年10月），頁150-165。

<sup>81</sup> 淺野裕一：〈《大學》の著作意圖——「大學之道」再考〉，《出土文獻から見た古史と儒家經典》（東京：汲古書院，2012年），第4章。

<sup>82</sup> 澤井啓一：〈荻生徂徠《大學》解釋〉，《フィロソフィア》（早稻田大學哲學會）第70號（1982年12月），頁151-166。

<sup>83</sup> 荻生茂博：〈大鹽中齋の人間觀——《大學》解釋をめぐる〉，《文化》第49卷（1985年9月），頁32-51。

<sup>84</sup> 早川雅子：〈淺見綱齋の《大學》解釋に關する一考察：思辨的理から情誼的理へ〉，《倫理學》（筑波大學）第5號（1987年3月），頁101-113。

て) (藤原惺窩の「格物」論)<sup>85</sup>、吉田公平〈中江藤樹の四書學〉(中江藤樹的四書學)<sup>86</sup>、大島晃〈林羅山の《大學諺解》について——その述作の方法と姿勢〉(關於林羅山の《大學諺解》——其撰述方法與態度)<sup>87</sup>、金泰昊〈山鹿素行の回歸點——《四書句讀大全大學》における「公共底」の「格物」論〉(山鹿素行の回歸點——《四書句讀大全大學》中「公共底」的「格物」論)<sup>88</sup>等。

近年亦有將視野拓展至東亞的研究，如澤井啓一〈東アジアのなかの徂徠《大學》解釋)<sup>89</sup>是將〈荻生徂徠《大學》解釋)<sup>90</sup>一文延伸至東亞觀點所撰寫之論文；中純夫〈丁若鏞の《大學》解釋について：李朝實學者の經書解釋〉(丁若鏞的《大學》詮釋：李朝實學者の經書詮釋)<sup>91</sup>則是研究韓國儒者的《大學》詮釋。

## 結 語

總括上述可以得知，在日本的《大學》研究，戰前以註釋、翻譯為主，並以探究原義為其研究目標，也有探討成書年代、作者的論文。戰後則繼承前期的成果，亦有註釋、翻譯，但研究方向有了轉變。研究內容與思想史的研究相呼應，著重朱熹之後的《大學》詮釋，已不再將重點放在探究原義上。成書年代、作者的問題討論在前期已經算是告一段落，後期是針對各個時代、每位思想家不同的《大學》詮釋，進行個別的研究。尤其是明代陽明後學的研究，在近年有豐富的成果。

另一方面，日本漢學，也就是江戶時期的《大學》研究亦有發展。前期主要成

<sup>85</sup> 楊宏民：〈藤原惺窩の「格物」論について〉，《立命館文學》第542號（1995年12月），頁592-613。

<sup>86</sup> 吉田公平：〈中江藤樹の四書學〉，《季刊日本思想史》第54號（1999年7月），頁3-15，後收入吉田公平：《日本における陽明學》，頁73-90。

<sup>87</sup> 大島晃：〈林羅山の《大學諺解》について——その述作の方法と姿勢〉，《漢文學：解釋與研究》第7輯（2004年12月），頁1-43。

<sup>88</sup> 金泰昊：〈山鹿素行の回歸點——《四書句讀大全大學》における「公共底」の「格物」論〉，《思想史研究》第9號（2008年9月），頁31-43。

<sup>89</sup> 澤井啓一：〈東アジアのなかの徂徠《大學》解釋〉，頁42-63。

<sup>90</sup> 參考註82。

<sup>91</sup> 中純夫：〈丁若鏞の《大學》解釋について：李朝實學者の經書解釋〉，《京都府立大學學術報告（人文、社會）》第54號（2002年12月），頁29a。

果在於翻刻文本，整理學派系統；後期則不僅直接承襲前人的成果，更將江戶儒學視為研究對象，探討其思想。對於《大學》的研究，也是在此脈絡下進行。近年開始有東亞方面的研究，若能結合日本漢學累積的研究成果提出新觀點，此領域應該會成為往後《大學》研究之新趨勢。

關於今後《大學》研究的展望，除上述以東亞、漢字文化圈為視野的研究外，陽明後學的研究亦有不少未開拓的部分，可望繼續探究。若以中國思想史研究的角度而言，朱子之後、陽明之前的元代至明初時期，屬於研究成果較少的時代，今後應該能有所發展。

以上概述近一百年日本的《大學》研究，本篇所舉之研究論文及專書，除了檢索日本各大圖書館藏書目錄外，亦參考了《日本研究經學論著目錄(1900-1992)》<sup>92</sup>、《日本儒學研究書目》<sup>93</sup>，獲益良多。若有資料收集不全，或是疏忽之處，希望各位先進能賜予指教。

---

<sup>92</sup> 林慶彰主編：《日本研究經學論著目錄(1900-1992)》（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3年）。

<sup>93</sup> 林慶彰、連清吉、金培懿編：《日本儒學研究書目（上、下）》（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8年）。

